

北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与影响

高艳萍 杨红林

【提要】北洋时期,由于北京政府对国家的统治力极为虚弱,加上20世纪之交中国社会所出现的权力转移、公共空间的扩大以及新兴社会思潮的传入等因素,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随之兴起。与此同时,这些力量逐渐汇聚成了一股“合力”,从而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盛极一时的公众舆论。尤其是在20世纪20年代,由于报刊等事业的兴起,公众舆论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家的内政外交。

【关键词】北洋时期 市民社会 公众舆论 报刊

【中图分类号】K25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09)01-0107-06

一、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

自晚清以来,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日益崛起。虽然有一些西方学者基本上否认中国存在现代性语境下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而只承认存在某些与“市民社会”相关联的现象,即“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①。然而如果从中国的实情出发,我们就会发现,在当时中国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口岸城市里,的确存在一个日益壮大的近代“市民社会”,而近代“市民社会”的崛起,其背景则是多方面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清政府发布的废除科举制的上谕,所带来的历史成果和具有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不但导致了传统政治领域的革命性变化,还引起了社会精英的流动、分化乃至结构的变化。而新型教育体系的建立,又很快催生了一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初期,由于封建王朝的覆灭以及随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都促使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较大发展,从而出现了许多学者所说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②

口岸城市的发达。作为不平等条约在中国的特殊产物,到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得到了很大发展。商业勃兴,人口集中,使得像上海、天津、汉口、广州这样的城市在整个国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近代“市民社会”可以说正是其直接产物。

新思潮的传播。近代以来,西方各种新的社会思潮纷纷涌进国门,无论是社会进化论、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还是国家主义、社会主义等,都曾拥有相当数量的信徒,并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启蒙民众的作用。

中央政权的衰落。与西方社会恰恰相反的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由于国家的中央政权变得衰落不堪,才为近代“市民社会”提供了成长的空间,专制的清朝末年如此,北洋时期也同样如此。

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式教育体系的建立,其

^① 参见罗威廉《晚清“市民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编《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② Janet Lloyd translated, Marie-Claire Bergere,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7.

最直接的结果就是新式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一个新的文化群体,活跃于如上海这样的中心城市。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然就导致了资产阶级力量的增强和社会角色的转换,传统的“四民社会”对商人的定位受到日益严重的挑战。凭借手中越来越强大的经济武器,借助于内部所形成的社团组织如商会、同业公会等,加之中央权力的衰落这一外部环境,他们开始谋求在国家事务中更多的“话语权”。当时就有文人不无妒意地感慨道:“民国以来,有两机关最忙:一曰电报局,一曰商会。遇有问题发生,此两机关几无不效劳者,殆药中之甘草欤?”^①这种感慨无疑是对现实无奈的承认。据有关学者统计,“商会作为资产阶级的团体,在1912~1927年期间有了较大的发展,这种发展既表现为组织的扩展,又表现为社会作用的增强。1912年,全国共有华商商会794个。而1919年5月刊行的统计则表明全国华商商会实存数已增至1238个,其中总商会55个”。^②

中国市民社会群体最活跃时期是在1895年~1922年间,当时该群体曾领导和参与了一系列国内的制度创新活动。^③到1922年之后,他们又开始积极参与到国家的外交事务当中,并发挥了重大影响。在这方面,最典型的当属上海资产阶级。1920年代前夕,上海的资产阶级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逐渐对整个国家的内政外交都拥有相当的发言权。在内政方面,“执掌上海总商会(包括其前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上海商务总会)领导权力的绅商头面人物和绅商领导体制下的上海总商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其介于官、商之间的特殊社会身份,为消除有碍于商务发展的官商隔阂,沟通官商联系,曾经起过积极作用。从解决历史进程中的突出社会矛盾来说,这也是为近代化扫除障碍”。^④1920年代初时,著名的商会领袖穆藕初甚至提出“是以在商言商之旧习已不复使用于今日,吾商民对于政治必须进而尽其应尽之责任,急起联合商界重要分子,用各种方法逼迫政府改良内政”。^⑤在对外方面,“上海总商会在积极组织各业厂商参加国际商品赛会或在上海

举办商品陈列的同时,始终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原则,对于损害我国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国际赛会,则坚决抵制,并明确表示态度,丝毫不作迁就让步”。^⑥

由于外部控制的相对松动,各种社会群体纷纷组成团体,以更有效地发挥力量。据统计,北京政府时期仅北京一地先后成立的团体就有360余个。^⑦甚至一些传统的边缘群体,如妇女界,也受新思潮的影响,开始在社会参与方面寻求自己的位置,并得到了时代的认可,到1922年前后,“中国妇女利用各地军阀修改宪法和制定省宪法的机会,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妇女参政运动”。^⑧这样,到“20世纪初年,随着一大批新型民间社团和自治机构的产生,中国城镇中传统公共领域开始发生某种带有体制意义的变革,呈现出若干近代性特征……城镇公共领域开始突破传统慈善、教育、公益的狭小格局,扩张到某些原本属于国家权力影响和控制下的领域”。^⑨可以说,整个“市民社会”都开始“思出其位”,从各个角落向世界发出自己声音,最终形成任何执政者都不能忽视的公众舆论。关于这一点,有学者曾较为中肯地评论道:“早期共和政体的全国性政治名流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是新行业的成员——教育家、律师、工程师、报人、现代商人和银

- ①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
- ②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46页。
- ③ 此项研究成果详见陶鹤山著《市民群体与制度创新——对中国现代化主体的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 ④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 ⑤ 穆藕初:《花贵纱贱之原因》,《上海总商会月报》第3卷第2号。
- ⑥ 徐鼎新、钱小明:《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第275页。
- ⑦ 于彤、袁风华:《北洋政府时期北京社团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1、2、3期。
- ⑧ 张莲波、周丽亚:《1922年前后中国妇女参政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响及争论》,《中州学刊》1998年第5期。
- ⑨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页。

行家……他们确在某种程度上逐步形成了拥有土地的名流，成为新成员的来流及‘舆论’根源”。^①

二、北洋时期公众舆论的勃兴

近代“市民社会”崛起以后，作为其意志反映的公众舆论事业也同时发达起来。尽管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之黑暗、社会之动乱、民生之凋蔽诸种现象向为后人所诟病，但这一时期公众舆论事业的发展却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

按照西方的标准，现代意义上的舆论(public opinion)，“汇集了多数人的智慧和思虑，因而它具有集合性；从舆论形成后传播的作用上看，它有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它具有影响力”，舆论的精神力量主要在于它不仅影响、改变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而且还会引发或者导致改变社会面貌的重大的社会行动。正因为舆论有如此巨大的作用，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曾称舆论为“世界之王”；而现代一些西方学者也称舆论为行政、立法、司法之后的社会的“第四权力”。

著名的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就深刻地认识到舆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他在为舆论定义时说：“夫舆论者何？多数人意见之公表于外者也”，并认为在社会生活中舆论是至高无上的，“舆论者，天地间最大之势力，未有能御者也。”^②到民国初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认识到舆论的力量，甚至乐观地说：“民国向例，凡悍然不顾舆论者，其始为一部分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全国舆论所不容，其继为旅外华人之舆论所不容，其继为各国之舆论所不容。于是‘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无病而死，不战自败。乃知中华民国未尝无舆论，而舆论之势未尝不强。此亦快心之谈也”。^③

舆论形成以后，就会履行自己应有的监督职能，这正是它对社会控制作用的主要表现之一，其表现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游行、集会、示威、组织社团等。整个北京政府时期，这些形式表现得是非常充分的，而新闻传播媒体的

发达则为舆论监督的实施提供了有力的武器。

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公众舆论史的林语堂认为，近代中国新闻舆论界有两个黄金时期，即1895年～1911年和1915年～1925年，而“1925年的五卅运动就表现了自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公众舆论发展的高潮”。^④的确，尤其是在1920年代，无论就数量还是影响力而言，中国的新闻舆论呈现出一派繁荣局面，这主要体现在报刊杂志方面，因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之一，是报刊舆论的作用与影响越来越显著。尽管由于中国特殊国情所致，报刊舆论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难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其独特作用仍不容忽略”。^⑤

我们不妨以北京、上海两地为个案进行考察。

北京作为当时北洋军阀的政府所在地、统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报刊业是比较发达的。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北京报刊的发达是受到双重因素的影响，内中既有政治相对民主化的作用，也有军阀为争权夺利而导致的政局混乱和生存空间的扩大。据统计，仅在1911年～1925年间，北京就先后有470余种报刊出现。^⑥当然，北京的这种情形是有非常特殊的背景的，因为在大多数时期内，“政界混乱，新闻界也是混乱的。许多军阀为了吹捧自己，攻击他人，纷纷办报纸、开通讯社。据《晨报》在1925年底公布接受北洋军阀六个机关‘宣传费’的报社，通讯社就有一百多家，加上那些空立名目，市面上见不着报纸的报社和不发稿的通讯社就更多了。大约总在二百家以上。那时北京的人

① 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1卷，第290页。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转引自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37页。

③ 杨荫杭：《老圃遗文辑》第107页，转引自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68页。

④ Lin YuTang, *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 Kellyand Walsh, Limited, Shanghai, 1936, p. 122.

⑤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0页。

⑥ 于彤：《北洋政府时期报刊通讯社一览》，《北京档案史料》1990年第2、3、4期；《北洋政府时期报刊通讯社一览补遗》，《北京档案史料》1991年第4期。

口只有一百万左右，居然有这么多的报社、通讯社，实在是畸形”。^①相比之下，上海的情形就更具有真实的历史意义。新闻史家认为，“在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上海的地位非常特殊。不少类型的报刊从这里发轫，这里的报刊业在全国最发达。究其原因，除了经济、文化、地理因素而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上海租界的存在。毋庸讳言，租界的存在对上海近代报刊的发展，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在租界的庇荫下，维新报纸得以进行舆论发动，政党报刊得以进行反政府的宣传活动、政见争论和理论斗争，商业报刊得以稳定发展”。^②结果使得上海在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成为中国乃至远东的新闻中心。据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统计，所藏解放前中国出版的报纸共4000多种，其中上海出版的有1800多种，上海创办的各类杂志，在全国出版的期刊中，所占的比重也是很大的，所以有人把上海称之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半壁江山。^③在上海众多的报刊当中，最有名的当数《申报》、《新闻报》及《东方杂志》等。这些报刊历史悠久，发行量大，影响自然也就广泛。尤其是在1920年代，它们基本上都迎来了辉煌时期。1916年~1926年间，《申报》、《新闻报》的发行量猛增，居然在短短的十年中增长了6倍，1926年达到14万份，以后几年又增加到15万份。^④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报刊界的行动指南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走在了时代前列，足以制造舆论并领导舆论。尽管它们都有不同的背景：《申报》、《新闻报》是较纯粹的商业化报纸，《东方杂志》是自由主义学者的阵地，上海《民国日报》则是当时较激进的国民党的机关报之一，而工商业者也以《上海总商会月报》为渠道发表对国家事务的看法。北京方面，《京报》也代表着激进自由主义者（如邵飘萍）的立场，《晨报》作为以梁启超等为核心的研究系的机关报对整个中国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而《现代评论》更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精英的传话筒，令当政者不无顾忌……但是总的来说，各报刊的主持者在很多方面的认识却有

着惊人的相通。一方面，他们逐渐了解到外部世界同行们的地位，羡慕“彼等之言，足以左右外人舆论与其政府之外交政策”。^⑤另一方面，他们又意识到自身所应有的责任和地位。申报的编辑葛预夫曾在《视本报五十周年系之以论》一文中指出，办《申报》的宗旨在“倡民权，迪民智，振民气，历国耻，启发国家思想，而明政治之善恶也”。^⑥梁启超也认为，报纸最主要的两大职能便是监督政府和向导国民，^⑦甚至有点过于自信地说“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⑧

三、报刊等公众舆论的社会影响

报刊对公众舆论的影响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真实地报道新闻事实，一是客观地发表言论。在这方面，1920年代的主要报刊分别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通过多元化的方式为公众舆论做出了一定贡献。

以《申报》、《时报》、《新闻报》、《世界日报》、《大公报》等为代表的商业化报纸，其主要优势在于大容量、迅速而真实的新闻报道。《申报》是近代中国新闻史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完善的新闻报纸，又由于它“是商业报纸，不偏不党，能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中国近代历史的真实，而民众向以上海报纸的报道为

① 张友鸾等著《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第44页。

②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6页。

③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前言》，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④ 据秦绍德《上海报刊史论》数据。

⑤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82年版，第139页。

⑥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页。

⑦ 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山西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118页。

⑧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3册，转引自上书，第118页。

准绳，故其从一侧面代表着时代与社会的变迁”。^①而其主持者史量才认为“报纸是舆论机关，具有劝导舆论和创造舆论的功能”。^②这些商业报纸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们有自己的办报宗旨，“不像政论报纸那样，无须靠精彩的政论征服人心，也不像政党报纸那样，不必为宣传一党的理论、主张竭尽全力。”^③尽管即使国外研究者也认为“民国时期的报界和它的英美同行相比，从未达到后者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影响，甚至和日本同行也无法相提并论……史量才主办的《申报》，在大多数情况下在政治上是缺乏勇气的”。^④但我们同样应该正视这样一个事实，据说在当时，“‘申报’这一个名词，在中国境内，几乎没有人不晓得的，无论这个人识字不识字，或者是老年的妇人，年青的小孩子，他都晓得，他们虽没有见过申报，但是他无论拿到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他不晓得，他就名之曰‘申报纸’；也颇有识字的人，他虽晓得别种报纸的名称，可是他往往就随便称任何报纸为‘申报纸’。这‘申报纸’三字，几乎在中国内地，是代表任何新闻纸的一个名称了”，^⑤因此我们丝毫没有理由怀疑其对民众所产生的影响。

当然，报刊对公众舆论所产生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犀利尖锐的言论来实现的，“这一时期的报纸，言论的重要性及影响仍是巨大的”，报人们“不仅强调报纸还是‘国民喉舌’，甚至提出，一部分报纸可以赖倾吐公众感情与愿望而产生和存在”，认为“言论理应是国民公共意志在报纸上的体现”。^⑥最明显的是一些政党和立场较为激进的报刊。北京政府时期，曾先后活跃过不少政党，不管它们的立场背景力量如何，毕竟都代表了相当群体的呼声。1920年代比较有影响的这类报刊有上海《民国日报》（国民党）、北京《晨报》（研究系）、《向导》周报（共产党）、《醒狮》周报（国家主义青年党）等。此外那些自由主义色彩的报刊，其中的言论部分往往也很具有时代感，大胆而敏锐，足可担当领导公众舆论之重任。比如《京报》是进步报人邵飘萍（振青）主办的报纸，该报在创刊词中坚决表示：“必使政府听

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为作也”。^⑦而当“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京报》从接到消息的6月1日起，连续20余天报道事实真相，募捐支援，并且不惜巨资发了三次特刊。邵飘萍写了20余篇评论，揭示事件发生的原因是‘不平等条约’，呼出了‘打倒外国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他的主持下，《京报》真正成为北方革命舆论的阵地”。^⑧即使像《东方杂志》这样的非政治色彩刊物，重要时刻也勇于振臂高呼，“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各大报刊摄于帝国主义压力，不敢揭露事实真相，更不敢对群众运动表示支持。可是在中国历史上刊期最长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东方杂志》，独树一帜，出版了充满爱国热情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特大号外……并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严正要求”。^⑨

即使在军阀统治较稳固的北方地区，舆论界的生存环境总的来说也比较有利。值得一提的是，当“袁世凯败亡，黎元洪、段祺瑞等执政后，北京政府下令解除报禁，废除《报纸条例》，以‘宣达民隐，提携舆论’”。^⑩而此后的近十年间，北京的舆论界的确拥有相当一定自由度。因为统治相对虚弱的军阀们为了获得有利的政治优势，也被迫利用报刊，收买“舆情”，这就给报刊的生存发展提供了“空间”。总之，无论是出于自觉还是被迫，1920年代北京政府的多数军阀、统治者基本上都能对舆论界表现出一些民主和宽容精神，而

① 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页。

② 胡太春：《中国近代新闻思想史》，第269页。

③ 秦绍德：《上海近代报刊史论》，第117页。

④ T·拉纳莫尔：《国民党与报界：〈申报〉个案研究（1927～1934）》，《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23。

⑤ 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16页。

⑥ 黄旦：《五四前后新闻思想的再认识》，《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⑦ 王文彬编著《中国现代报史资料辑》，重庆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

⑧⑩ 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80页。

⑨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45页。

像张宗昌之流则实属罕见。^①

或许正是受到这些现象的鼓舞，当时的舆论界人士表现出了相当的乐观态度，他们均对报刊寄予很高的期望，认为它们应该与政府国民发生紧密的联系。戈公振就曾说：“报纸者，表现一般国民之公共意志，而成立舆论者也。故记者之天职，与其谓为制造舆论，不如谓为代表舆论；更进一步言之，与其令其起而言，不如令其坐而听，耳有所听，手有所记，举凡国民欢笑呻吟哭泣之声，莫不活跃纸上，如留音机然。”^②甚至有人将报纸之使命提高到一个极点：“近世人类文明最大之珍宝，曰科学，曰德谟克拉西，而报纸者，乃为维护发扬此两大珍宝之利器也……报纸者，无微不至，无远弗届，无孔不入，无人不需之物也。近世富有权威之物，诚莫如报纸之作用，则尤有加焉。”^③

作为近代中国舆论中心的报界，一旦自身地位有所改善，就会紧跟时代，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表示热烈的关注，1920年代尤其如此。时人指出：“自主体言之，欧战以后，报界思想之进步，不可不谓一线曙光。如对内则作为废督裁兵之主张，对外则有所谓废除不平等条约之论调，苟循斯途以进行，则去中华民族自决之期不远矣”。^④他们不断强调“报纸是现代社会中一种最大实力。握有这种实力的人，应该以其实力，去督责或抵抗强有力的政

府”。^⑤

报刊的发展只是为公众舆论的表现提供了必要的载体，民国以来兴起的各种社会力量，基本上都拥有这种载体，再加上其他如发电报、向公众演讲、组织社团、请愿游行示威等渠道，最终汇集成影响力极大的“民意”，而这种“民意”是任何当政者都不敢漠视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它才能在北京政府时期的各种政治活动演进过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本文作者：高艳萍是廊坊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讲师，南开大学毕业历史学硕士；杨红林是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近代史系毕业历史学硕士

责任编辑：赵俊

① 系指张宗昌1926年入京后，大肆摧残舆论界，于1926年4月24日封闭《京报》馆，逮捕主笔邵飘萍，并以宣传赤化为罪名于26日枪杀于天桥；又8月6日，《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亦被枪杀。

②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362~363页。

③ 上海日报公会：《上海之报界》，1929年印行，第2页。

④ 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转引自朱传誉著《中国民意与新闻自由发展史》，第512页。

⑤ 《对于中国报界罪言》，《现代评论》（周年纪念增刊）。

On the Vigorous Growth and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in Northern Warlords Period

Gao Yanping Yang Honglin

Abstract: In the Northern Warlords period, because the power of Peking Government was extremely weak, the “civil society” of modern China rose with the power transfer in the join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expansion of public space and the spread of new social trend. At the same time, these forces gradually united as “joint efforts” and led to the flourishing public opinion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Especially in the 1920s, the public opinion affected the country’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 to a great extent due to the vigorous growth of the press.

Key words: the Northern Warlords period; civil society; public opinion; the press